

当代
经济学
系列
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中国：理想经济增长

周天勇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联系到我们：

邮箱：hibooks@hibooks.cn



微信



天猫

上架建议：经济学

ISBN 978-7-5432-3043-9



9 787543 230439 >

定价：75.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格致网：www.hibooks.cn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中国：理想经济增长

周天勇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理想经济增长/周天勇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5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文库)

ISBN 978-7-5432-3043-9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2497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中国:理想经济增长

周天勇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3
字 数 302,000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3043-9/F·1246
定 价 75.00 元

主 编 的 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

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厉所

2014年1月1日

前言：唯有改革和发展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获得经济增长潜能分析的一个逻辑思路和框架

从2014年初开始，我及我的团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拟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特别是探索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在未来的十余年中还能够中高速增长，并给出一个可行、可用和可操作的方案，这两个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研究，耗费了五年多之久时间。前者以《中国：增长放缓之谜》已经出版。其间，后半段工作以“推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突破性改革研究”申请，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BJL002）项目资助，形成此研究成果，终于以这本《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与读者见面，也算是对我们努力的一种鼓励。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中国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任务，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美好梦想。国民经济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可能有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风险。从2008年算起，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行了11年，自

8%的增长速度跌下来也有7年之久。中国作为有13.9亿多人口、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的国家，经济增长是景气还是低迷，不仅是中国自己关切，也受到世界各国政府、企业、民众和研究界的密切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和命运，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景气和未来。

一、对未来的趋势和格局应当有个清醒的判断

合理解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原因的目的，在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思考、规划和提出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行动方案。然而，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需要先理清一些对形势和未来趋势的判断。

1. 国民经济仍然需要中高速增长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经济结构会服务业化，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外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应当不再追求跨越式发展，而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重，似乎以中速甚至低速度增长，我们也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观点值得商榷。

(1) 从历史上看，许多学者们关于增长景气的看法，往往比经济发展的实际走势要悲观得多。1987—1991年间，国内经济学界就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多少合适进行了大讨论。当时主流经济学家们公认和提出的中国适度经济增长率是5%，并一度成为计划部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依据。后来由不是经济学家的邓小平同志反对而作罢。

(2) 在战术上对未来经济增速下行问题需要看得严峻一些。我们应当将内部人口变动和外部出口导向发展条件变化等因素影响的国民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考虑得严峻一些。二战后，世界上人口大国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为数很少。而且高收入国家门槛是动态提高的，如果无所作为，任其经济自然增长，或者发生战略失误、体制长期扭曲和政策出台不当，可以确定地判断，未来中国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

(3) 经济学家和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学教科书中宏观经济的目标通常有四，其中之一就是在可能条件下努力争取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越南等，还是处在经济

发达水平上的美国、日本和韩国等，无不将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速度快一些当作自己执政的首要任务。除非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原因，主动在通缩和衰退情况下，论证经济增长速度应当放慢，并作为政策建议提交给政府决策的学者并不多见。

因此，学术和政策研究界，客观上要把国民经济面临的风险看得严重一些，主观上要多提一些有为的建议，尽可能地对未来形势有个清醒的判断；但是，也有主动正确的发展战略，有靠谱和可操作的方案，通过积极地进行针对性和有力度的改革，出台组合性的、互不矛盾的和有效的经济政策，尽可能地挖掘经济增长的潜能，将中国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时间加以延长。

2. 工业化并没有结束与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

对于城市化，一些学者则根据目前的数据，乐观地认为，对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推动潜力。中国的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一直是学界的共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应当去工业化。还有的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将来自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这些判断也需要商榷。

(1) 城市化还有支撑经济增速不严重下行的力量，但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战略组合和体制改革。从近几年城乡各自内部和城乡相互间流动的一些关键性数据看，农村和农业模块中人口和劳动力淤积严重，资金稀缺，劳均土地水平太低；城市和非农业中产能过剩；农村和农业的资金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城镇资金和产业又向国外流动的压力很大，城镇也向农村和农业排斥普通劳动力。虽然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户籍居民收入差距不小，特别是农村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更大，两模块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相互流动压力差，但是却发生了严重的梗阻，在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似乎也开始停止了。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们的分析中也发现，原来许多学者，包括我以为通过取消户籍限制、改革土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居住等措施，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给经济增长每年带来1—2个百分点的新潜能。但是，经过推算分析发现，由于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结构老龄化对经济的收缩力过大，改革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新增长潜能并不如过去猜想的那样大。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既然城乡模块间人口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梗阻很严重，推进城市化获得的增长潜能也不大，就可以放弃继续推动人口城市化的战略？这是

绝对错误的选择。因为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本身有着推动增长的潜能，只不过被人口收缩所吸收和平衡了。如果不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任其人口收缩变量左右格局，中国二元结构转型推动的增长和发展能力将会坍塌，经济增长速度得不到人口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支撑，下行幅度会更大。

(2) 工业化发展阶段并没有结束，需要在战略上延长工业化的时间；服务业升级应当自然和放活发展，但不能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筹码主要压在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方面。工业化是否结束？不能仅仅从工业产能过剩方面看。一是从2017年各层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观察，城镇户籍居民41100元，城镇非户籍居民24600元，农村常住户籍居民13432元；他们的收入消费率分别是67%、77%和81%。农村居民5.7亿人，其高品质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等工业化时代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4，农业就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转移的生产率压力差很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人口的收入水平较低，不能购买并平衡资本和技术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致使2017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7%。如果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比缩小到1:1.5，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缩小到1:2，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农村居民人口收入水平不断地提高，工业化还会有十余年的时间。在农村居民收入长期低下及他们向城市转移长期受到阻碍，并且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企图用经济结构的服务业化，来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扭曲。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化转型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速度，并且可能很快跌入低速。这是因为工业品生产为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较高，而服务业一般因不能大规模化和标准化从而劳动成本较高。因此，服务业是阻碍经济增长快速发展的领域。

3. 技术进步替代传统增长动能中短期内有不确定性

一些学者提出，加快技术进步，促进新经济发展，其带来的加速可以替代由于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而放缓的增长速度；有的学者认为，智能经济和无人制造及服务，将大规模替代劳动力，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有学者研究得出，移动通信、大数据、极速运算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使服务业提高生产率，摆脱“鲍莫尔诅咒”，获得经济增长的新潜能。这些

观点，也需要认真加以讨论。

(1) 短中期内，技术进步在哪个时间点上会爆发性推动经济增长，有不确定性。从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暴露的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差距来看，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创新不足，前沿和颠覆性技术储备较少，原创型技术缺乏、新技术产业化条件较差。新技术从理论研究到形成技术，再到新技术产业化，需要较雄厚的积淀和较长的时间。突破性技术进步和产业集群式发展，在十余年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中，我们应当努力争取，但并不能确定转型发展在哪个时间点会显著地发生。

(2) 从经济结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两个时段看，技术进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中的功效也不一样。蒸汽机、纺织机等颠覆性的技术，实现了作坊式生产转向大机器制造的工业革命。工业时代，是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目前近8亿人口的工业化时代的物质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没有满足的工业品的制造技术，业已完全成熟，只要提高这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继续推进工业化，就可以得到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要舍其本，而将增长的筹码压在目前还力所不及，中长期内也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技术进步方面呢？

(3) 在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时代，虽然智能技术在一些方面会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居民生活服务业消费比例也会上升，但是绝大部分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比例会超过居住和制造品等消费的比例吗？可能不会。而从目前工业品需要还远没有满足的中国8亿左右人口的消费看，他们会舍其基本的物质消费而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新服务消费吗？可能也不会。虽然我们在一些服务业领域中可以无人化，但是比如我们无法把一万人集中起来用智能机器人提供理发服务。而从劳动力知识和技能跨时滞后的结构性看，在一些智能化制造和服务业领域，对于目前农业领域的2亿左右劳动力，2.86亿农民工劳动力，以及采矿、建筑和制造业领域只具备传统知识和技能了几千万劳动力，还有一个在新经济中能不能找到工作岗位或适应与否的问题。大量传统和普通的劳动力失业率上升，其收入水平绝对减少或增长缓慢，而智能技术和新经济创造的财富爆发式增长，会形成生产更加过剩的局面，使经济增长更加乏力。

二、市场化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唯一途径

本书讨论了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2011 年间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有三次下行期和三次上行期。这段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没有一次是不采取突破性改革措施而自然恢复到上行状态的，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重新启动到上行趋势的；然而，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动力都是递减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中国这样一个要素非市场配置扭曲很大，体制仍旧在转型中的国家，没有改革，就不会有新的经济增长活力、动力和潜能。

当然，学术和政策研究界，都认为国内人口红利消失和出口受到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影响后，我们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推动未来的经济中高速增长。然而，改革哪些体制，每项改革各自会获得多少增长潜能，最主要的增长潜能来自什么方面的改革，等等，对此各说各话，意见不一，大多为定性的猜测性分析。这样的研究，对于政策参谋、讨论、制定，以及决策执行，都会带来心中无数、走一步看一步的不佳效果。因此，寻找一种较科学的分析方法，选择红利潜能大、速度支撑力强的改革领域，能够量化地规划改革方案，是经济学界开展学术和政策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1. 改革的增长潜能：分析方法需要颠覆性创新

计算经济增长有各经济学流派的模型，典型凯恩斯主义的有哈罗德—多玛模型，强调国家干预和政府主导；新古典主义模型有索洛的生产函数模型，奉行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经济理念。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时，由于出口需求回落和投资需求刺激乏力，摆脱了过去凯恩斯需求决定增长和需求侧国民经济管理的分析思路，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索洛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意味着学术界资源配置的政策含义从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的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相继写进了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告中。^①从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0 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 年 10 月 27 日。

年来采用这一方法，包括一些改造和扩展的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及其原因的讨论，以及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预判及其改革和政策对策等两个方面。

但是，索洛生产函数，有其严格的市场经济条件和假设：市场完全竞争，要素自由流动，配置由市场决定，价格由稀缺和供求形成，要素有价值表达等；政府不过度干预资源配置，而只弥补市场失灵部分。因此，直接套用索洛模型对中国要素的投入产出，以及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进行观测，进而分析其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的不妥在于：一些体制本来就不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要求；建议可能重在改善要素投入效益、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质量等方面，而对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不可能有直接的针对性。

因此，需要用“应当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这样的反事实分析思路，即：先考虑一个市场经济运行体，它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中，应该满足哪些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再考虑一个经济体由于没有满足市场经济的条件和假设，其要素投入和配置受到干扰，造成了效率和产出等方面的损失；最后讨论如果还原和满足这些条件和假设，那么可以将经济效率、投入和产出从扭曲状态改善到正常状态后的情形。

市场经济，有几个重要方面的条件和标准。首先，要素和资源是由市场配置，还是政府干预市场配置，或者是直接由政府配置。其次，在一定人均 GDP 发展水平上，有着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城市化、农业就业、工业化等结构性比例。如果二者之间偏差较大，就说明不符合标准。再次，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GDP 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政府如果对此进行过度干预，则“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条件可能不成立。

实际上生产函数的许多条件和假设，具体讲，就是市场经济严格的标准，就是市场经济各方面的体制。这样，我们可以用还原市场经济条件的思路，针对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情景，设计一个分析的逻辑过程和框架。

首先，从总的方面来看，在条件还原和体制改革能够获得多少经济增长新潜能方面，需要选取一个“不进行体制改革，或者体制改革不能被顺利落实和完成”情况下未来动态经济增长的可能预测，以此为基准和参照，观察总体和每项假设条件还原性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的新

潜能，以及加上新改革潜能后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各项改革能够获得各方面经济增长新潜能的分布结构方面，在方法论上，需要考虑的是各假设条件不成立的偏差有多大，也即还原各假设条件的参照系是什么，并且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化。具体而言：（1）就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分配与在企业资本配置方面：以人均 GDP 同样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为参照系，如果过高就意味着政府干预过度，多分配了应该为企业资本的部分；以不同发展水平上的适度宏观税负作为标准，进行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减税减费改革。（2）在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以同样人均 GDP 发展阶段，且文化传统、政治与经济组合、经济发展战略、土地改革历史、人均土地资源等相近国家和地区为参照系，以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为标准，判断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方面的偏差，并设置为改革要到达的应有条件。（3）各类要素由市场决定配置且可以交易，应当是市场经济体系最基本的条件要求，在土地要素价值表达和配置方面：以其是不是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作为参照系，讨论目前由于土地要素市场交易受限，在农村和城镇中隐匿的土地价值，并计算由于不能交易体现价值、不能以地为本投资创业、土地资源闲置等造成的财富和资本的损失。（4）要素供给竞争中性是市场经济的另一准则，通过测算土地和资金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间的配置缺乏竞争中性产生的损失，从而论证须进行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间配置体制的改革。

再次，在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还原方面：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GDP 比例为参照系，计算政府对人口生育、迁移流动、土地财产权和以地为本创业等方面的干预造成的收入损失，以及对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影响，计算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与产能供给的不平衡，并考虑进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关体制改革。最后，以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为标准，规划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目标和行动。

2. 信心在于改革：未来增长潜能的计算和展望

从还原法的计算看，先是考虑在不改革、不采取重大发展战略举措情

况下，自然的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再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要素产权和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以及不同改革形成潜能的结构分布；如果生产和市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循环条件缺失，增长潜能变成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还要估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以及 GDP 结构中的还原和改善。最后，计算和观察通过改革获得增长动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同力度的改革下人均 GDP 水平何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1) 经济自然增长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由于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结构严重老龄化，根据人口增长影响 20 年后经济增长定律，如果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以及实施重大的发展战略，中国在 2019—2035 年间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本书第 1 章 (1.1)，笔者模拟了 1998—2015 年人口增长率与 2018—2035 年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按照回归的预测，2018—2020 年 GDP 增长率存在着从 5.9% 下降到 4.38% 左右的人口收缩带来的下行压力，2021—2025 年间 GDP 增长速度存在着从 3.64% 下降到 3.12% 的人口收缩带来的下行压力，2026—2030 年间中国国民经济存在着 5 年平均 2.28% 左右增长速度的下拽压力，2031—2035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略微提高至 2.43%。

(2) 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潜能估算。

将“应该有而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而实际没有那么多”的逻辑数理化，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不同项目进行反向计算，观察由于达不到市场经济要求、条件、标准等造成的损失。乐观的展望是，总体上通过各种假设条件，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还原，推进各项要素流动、交易等配置体制的改革，估计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可以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前述人口因素决定较低水平的增长趋势基础之上，在未来的 17 年时间里，平均获得 2 个百分点左右的新增长潜能，从而在这一阶段中，支撑和实现国民经济 7%—6%—5% 的中高速增长。

资金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从中国国民经济资金要素配置和投入看，对效率和产出的较大影响：一是政府过度组织收入，超过 GDP 合理宏观税负标准，使资金要素在企业资本中的配置规模减小；二是按照市场经济竞争中性原则，由于歧视性分配资金要素，银行贷款、债券

和股权资本等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配置的效率不同，将民企配置应有高效率与现实国企配置低效率之差，乘以被错配资金的规模，就是国民经济产出损失。如果进行减税降费改革，将宏观税负率降低到相同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标准水平上，同时对资金供给进行市场经济竞争体制还原改革，将会获得新的增长潜能。按三年时间宏观税费水平降低到合理水平，需要减税共计 55 476 亿元，推动 2019—2021 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年平均加快 0.425 个百分点。虽然减税降费获得的潜能似乎并不大。但是，如果不切实进行此项改革，由于企业在市场需求萎缩时，高成本无法通过价格上涨和生产规模扩大及薄利多销等转移，会形成大规模的关停倒闭潮。资金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低方案下每年可获得的增长潜在 0.23%—0.25% 之间，高方案下每年可获得的增长潜在 0.23%—0.36% 之间。

劳动力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体制改革，可以计算得到 2019—2035 年城市化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获得的动态新增长潜能：2019—2025 年平均为 0.46%，2026—2030 年平均为 0.20%，2031—2035 年平均为 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表面看起来，此项改革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新潜能并不大，但是，如果轻视或者不进行这项改革，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将会被增强和放大。

土地配置扭曲损失与其改革的增长潜能。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农村和城镇大规模的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一部分为零价格的划拨土地，相当多的土地由政府管制而不能交易、没有价值表达，其配置或者在供给方面由政府行政征用，或者在行政寡头垄断市场上“招、拍、挂”出让，这与“要素配置由市场交易决定”这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不相符合，严重扭曲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信号和机制。城乡土地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总体上，在 2019—2035 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下在 1.30%—1.51% 之间，高方案下在 2.2%—2.53% 之间。

(3) 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与进入高收入门槛展望。

讨论到上文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部分，并没有结束。前面已述，索

洛生产函数模型还有一个假定，就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实际上，如果政府的一些政策如人口、迁移、公共服务、住宅、土地政策，干预和妨碍了居民的收入，则会发生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导致投入形成的产出过剩。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在既定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能及时出清，或者出清滞后时，表面上似乎资本的生产率下降，其实是要素在需求不足时的利用率不足形成了负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从国民经济分配及支出运行看，与高积累、低消费的计划经济国家不同，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GDP 份额也有一个大体的比例，即分别在 60% 和 50% 左右，这也应当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两个重要标准。而 2017 年，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 43% 和 30%，分别与标准值相差了 17 和 20 个百分点。

因此，除了上述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外，很重要的工作，一是逐步地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向市场经济国家这方面的结构水平趋近；二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消除生产过剩，还原市场经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环境条件。

首先，放开人口的迁移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会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从农村居民收入比与城镇户籍居民收入比 1:3.1，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村劳动生产率 1:4 看，结构上仍然存在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以及农业领域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配置流动的巨大压力差。城市化，特别是市民化的城市化并没有结束，还有十余年的时间。应当让人口和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使他们能够从创业和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的企业、产业和区域，向创业和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的企业、产业和区域配置。就业是大部分居民收入最基本的来源，而创业除了自我雇佣外，还可以以一带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收入。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看，在前期重点建筑物和城区面积等城市化的基础上，加快平等、公平的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和再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居民收入，成为最关键的战略性选择。

其次，让农民能够公平地得到土地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收入。与东亚经典发展模式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转型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来